

理学视域下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

杨宗红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理学视域下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

杨宗红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学视域下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 / 杨宗红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668 - 1768 - 6

I. ①理… II. ①杨…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2822 号

理学视域下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

LIXUE SHIYU XIA MINGMOQINGCHU HUABEN XIAOSHUO YANJIU

著 者: 杨宗红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刘 晶

责任编辑: 刘慧玲

责任校对: 颜 彦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4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话本小说的理学空间研究	007
第一节 话本小说地域空间分布与理学地域空间分布	007
一、拟话本小说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	008
二、福建理学与拟话本小说刊刻	009
三、江西、安徽理学与拟话本小说编撰	011
四、江浙理学与拟话本小说编撰	014
第二节 话本小说与理学劝善的关系	017
一、明清之际儒者的劝善活动	018
二、明末清初儒者对善书的参与	020
第三节 明末清初小说的理学价值取向与善书	024
一、话本小说题材及叙事模式等与善书的一致性	024
二、话本小说劝善性原因考察——关于善书	029
三、话本小说劝善性考察——关于小说劝善传统	031
四、话本小说中的劝善	033
第二章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家的治经活动及理学思想	036
第一节 冯梦龙的治经活动及理学思想	036
一、冯梦龙的春秋学	036
二、冯梦龙春秋学特色	038
三、冯梦龙春秋学之义理举隅	044
四、冯梦龙春秋学对小说编撰之影响	049
五、冯梦龙的四书学	055
第二节 凌濛初的诗经学研究及理学思想	064
一、《圣门传诗嫡冢》——凌濛初的《诗经》经学观	064

二、《言诗翼》——凌濛初的《诗经》文学观	070
三、《诗逆》——凌濛初的《诗经》阐释方法	081
四、凌濛初治《诗经》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084
第三章 理学与话本小说的心性表达	087
第一节 神灵书写的心性意识	087
一、道德与神灵	088
二、技与神	092
第二节 鬼怪叙事与正心诚意	094
一、心性不修与鬼怪为祟	095
二、正心、正意——御鬼与御怪	100
三、化异类故事与心性修养	103
第三节 冥游经历与心性悟修	105
一、地狱游历，感悟心性	106
二、地狱受罚，重修心性	110
第四章 理学与话本小说的秩序诉求	113
第一节 话本小说对政治秩序的探究	113
一、话本小说对无良政治秩序的揭露与批判	114
二、“格其非心”，以道德救世	122
三、德治之外——小说家对政治秩序的继续探究	129
第二节 话本小说的婚姻家庭秩序	132
一、酒色财气与家庭伦理失范	134
二、话本小说对构建和谐家庭的思考	148
第三节 话本小说中的社会交往秩序	156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157
二、商品经济下和谐社会秩序的展示	162
第四节 话本小说中的人与自然秩序	168
一、理想的栖居——仙境、地穴与风水	171
二、与自然为友——惜物与放生	175
三、自然的精灵——精怪与宝物	178

第五章 理学对话本小说选材及编撰的影响	183
第一节 话本小说的编撰与理学关系考察	184
一、宋明理学的文理观	184
二、话本小说编撰与理学劝善	186
三、话本小说的编撰与理学“格物说”	197
第二节 世情故事与理学	205
一、经权观与小说的灵动叙事	205
二、尊身观与小说的情理叙事	212
三、心性论与小说的“气”叙事	215
四、批判性：世情故事的现实性与理学关系	221
第三节 公案故事与理学	226
一、诉讼与审判的天理原则	227
二、天理、刑讯与义理决狱	232
三、天理与话本公案故事的委曲叙事	242
第六章 理学与话本小说的形式表达	247
第一节 有意味的形式	247
第二节 性气论与话本小说人物的模式化	250
一、类型化人物的表现方法	251
二、人物类型化形式的“意味”	254
第三节 道与技：理学与话本小说的叙事分析	262
一、至情论与话本小说的叙事	263
二、理欲冲突与话本小说的情节模式	268
三、天命与天理：关于帝王将相的神异叙事	269
第四节 特殊的形式与载道精神	273
一、《豆棚闲话》	273
二、《十二楼》	278
第五节 关于宋明理学与话本小说衰落的思考	282
参考文献	286

绪 论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重要形态，其兴盛、繁荣和衰弱都处于思想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理学氛围之中。宋代初期，小说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与唐传奇小说作者多是“精英文人”，作品主要反映精英阶层的生活状态、思想观念与情感，读者多为精英阶层的人不同，宋代白话小说更多面向民间。当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对社会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波及文学领域。李时人教授指出：“在政治、经济与文学之间还存在一个重要的‘中介’，那就是‘思想文化’。而‘思想文化’是有着多层次结构的，那些在特定经济、政治条件下群众精神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不稳定的情绪、感情、愿望、要求、风俗习惯、道德风尚、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是它的低级形态；系统的哲学理论、学术观念、政治思想、宗教义理则是它的高级形态。如果我们从历史思想文化状况及其发展来考察文学，将会得到一些更深入的认识。”^① 所以，研究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不能不知理学。

明代理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前期是程朱理学，中后期是阳明心学，末期是对二者的反思与总结。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将理学视为国家正统。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乡会试四书以朱熹集注为准，经义以程颐、朱熹之注为准。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下诏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程朱理学成为明朝的治国思想。与此相适应的是，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作为程式，内容以程朱为宗。至明中叶，整个思想界“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②。程朱理学的独尊必然导致其僵化，为挽救程朱之弊，王阳明高倡人的主体价值，将外在的天理化为自我意志，使空泛的天理走向活泼的当下。这种对自我、对当下的关注极大地吸

^① 李时人：《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与杂剧的繁盛》，《光明日报》，1985年12月31日。

^② 朱彝尊：《曝书亭集》（上册），国学整理社出版，世界书局发行，1937年，第434—435页。

引了世人。“正、嘉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①“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②

然而，王阳明与程朱、心学与程朱理学并非二元对立。恰恰相反，二者在尊孔孟、扶持名教上有很多共同之处。郑玉比较了朱熹与陆九渊思想之同，反对学者不求其同而求其异的做法：“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各因其质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达道，岂有不同者？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此岂善学者哉？”^③刘宗周指出，“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处”。^④黄宗羲认可老师的观点，云：“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⑤在主观上，阳明心学是对孔学和程朱理学的发展而非反动，对于心学的重视并非否定孔子与程朱。将明清之际的心学思潮贴上对程朱理学的“反动”或者“反理学思潮”的标签有些欠妥。

明末，虽然世俗社会普遍认同王学（即阳明心学），但程朱理学仍是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势力依然很大。对此，罗宗强这样表述：

世人常常将晚明看作重自我、重个性、重情欲之时代。以为此种之重自我、重个性、重情欲，乃是其时之思想主潮。颜钧之下狱，何心隐、李贽之死，却说明着此种之思想潮流，其时并非处于正统之地位。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之士人，都有反对此一思想潮流之言说。从政权运作，从合法性而言，程、朱理学仍然处于正统之地位。重自我、重个性、重情欲之成为思想潮流，是在世俗生活中，在市民社会与自我边缘化的士人中。

.....

自思想之发展言，明代后期亦处于巨大之变动中。自发展脉络之大

① 顾宪成：《泾皋藏稿》，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3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66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2页。

③ 黄宗羲等编：《宋元学案4》，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80-681页。

④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199页。

⑤ 黄宗羲等编：《宋元学案3》，见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体言，明前期是程、朱理学，中间是阳明心学，最后又回归程、朱理学。但这只是大体，其中之交错纠结，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

王学的出现事实上并没有取代程、朱理学之正统地位。即使在阳明于征战平叛中弦歌讲论创立此一学派的声望极高之时，在王门子弟四处讲学，王学之发展声势浩大之时，亦未曾动摇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之地位。除了徐阶为首辅的很短一段时间王学公然进入朝廷之外，王学一直以在野之姿态存在着，无论它当时在士人中有多么大之影响。^①

明末清初，世人主要处于两种哲学思潮之中，一是程朱理学，一是阳明心学，融合朱陆成为主要的学术风向。这种学风直接影响到了话本小说的书写。通常而言，受某种思想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相应的、系统的文学观，或者围绕着这种思想展开文学理论的思辨。传统文化、世俗伦理、个体人格及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个体对这种思想接受的向度与深度。只有对这种思想产生共鸣，才会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作为官方学术与社会主流文化思潮，程朱理学对士人的影响毋庸置疑。阳明心学作为亚文化，是对程朱理学的修补与建设，处于次要地位。如果说对圣人人格的追求唤起了士人对超越精神的向往，其拘束之病引起了士人的反感与反思的话，那么阳明心学以其体认当下与自心、关注日常等则激起了市民阶层的兴趣。当言说心学的影响时，并不意味着对程朱理学的否定或悖逆。无论是出于教化的心态，还是愉悦人或者是商业化的心态，小说家都受时代文化的影响，他们无论对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一概采用“拿来主义”。

当然，如此一来，主观与客观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疏离。如妇女的家庭地位、贞节观，商人的价值等。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说，小说中的很多“人欲”是该灭的。但是细究这些故事，仍与程朱有一致之处。所以，以阳明心学言其反程朱，无论从心学的发生还是目的考虑，都不符合实际。研究话本小说，应该兼顾小说的主观向度与客观效果。事实上，小说家既肯定真情、物欲追求，也肯定社会道德秩序。前者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后者是对社会生命的关注。个体与社会的张力影响了小说的张力，也进一步影响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论争。体现在小说中，则是情与理的颉颃，是程朱与陆王的复杂交织。因此，在具体研究

^①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3、525-526页。

中,除了某些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某派理学思想特征的小说篇目外,其他虽然受到各种理学思想影响,但其流派特征模糊的篇目不应该,也不需要硬性贴上某理学派别的标签。

理学与小说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各种不同的观点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使之呈现出多彩斑斓的审美形态:“传统儒学在明清时期的变革与进展,亦即理学的发展与演变,对其时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或大或小或浅或深的影响,尤以对小说的影响为突出和显著。它显著地体现在理学与小说思潮的关系上,这就是理学复辟与小说尚理思潮、阳明心学与小说浪漫化思潮、泰州学派与小说世俗化倾向、乾嘉学风与小说炫耀才学风尚。”^①另一方面,小说又反过来促进理学的传播。宋明理学之所以在社会上能够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元以后戏曲和小说在社会中广泛流传,一些封建文人往往通过这些文艺形式来宣扬理学。由于戏曲和小说多是以形象化的形式表现故事内容,故在社会上一经传播,就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②。话本小说篇幅的短小性,题材的多样性,表达方式的灵活性,使之既具有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文人性。相对于文言小说与长篇白话小说,话本小说更贴近民众生活,也更适用于将深奥的义理化为生动形象的故事来教化民众。由于话本小说“文备众体”,从中也就更能窥见理学与文学的复杂关联。

20世纪80年代,已有探究理学与明清小说关系的论著,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第十章“明代中后期的反理学思潮与小说”、许总的《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第九章第四节都谈到明代四大奇书的反理学意蕴。宋克夫的《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朱恒夫的《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赵兴勤的《理学思潮与世情故事》以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探究理学对它们的影响。朱恒夫认为古代小说真正反理学的“为数极少,且影响甚微”,大多数小说家都是通过形象化、平民化的创作,自觉地做起了理学的传声筒。理学导致小说“理念先行与主题提前定位”,人物性格结构单一,情节结构动静相依。话本、明清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幻想小说与世情故事、理学小说都是在理学的笼罩下演绎的。赵兴勤全方位地剖析了理学异端学说对世情故事的引发、情节构筑的作用以及对世情故事内容

① 张次第:《明清儒学的发展与其时小说思潮嬗变》,《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 李锦全:《“命”与“分”:从清代小说的几个事例看宋明理学对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影响》,见《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5页。

的制约，详细梳理了《金瓶梅词话》对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以及《红楼梦》的深远影响。总体来说，学界关于理学与小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方面，而在话本小说方面研究相对不足。

关于理学与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关系的探讨，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理学”论调及其质疑。受学界将宋明理学视为正统而将阳明心学视为程朱理学的“反动”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把小说中属于市民新思想、新观念的内容当成是“反理学”或对宋明理学的否定，如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三言二拍”中的许多故事是对正统儒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叛逆。此观点忽视了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及发展。亦有对“反理学”提出质疑者。易小斌撰文指出，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在核心问题是相同的，“三言”更多地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并没有跳出理学思想的樊篱。事实上，话本小说对这两种思想都有接受。然而遗憾的是，学人对此论析不够。二是从道德关怀的角度论述，这是研究的主要倾向，如全贤淑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研究》可算此方面的专著。此外，张勇、朱海燕、林开强、胡莲玉、段江丽等学者的作品部分论及于此。三是理学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影响。陈铭认为，宋明理学使得人物形象概念化、公式化和脸谱化，艺术结构程式化，创作主旨训诫化，理学对小说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①

理学对话本小说本身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话本小说的观照既要将其放到当时主流文化——理学的语境中，也要放到民间的亚文化的语境中及话本小说叙事场景中综合考察，兼顾话本小说创作及刊刻、接受者所处的理学场域。明末清初，程朱理学、阳明心学、明清实学相互交融，共同对话本小说产生影响，但学界在对话本小说的多元文化的解读中，关于理学对话本小说的影响多集中在道德伦理关怀的层面，缺少对理学与话本小说关系的全面深入的探讨。

理学对话本小说的影响是通过小说家实现的。而且，一部分话本小说家理学修养很高，像冯梦龙就编有一些理学著作，如《春秋衡库》《麟经指月》《四书指月》等；凌濛初所著的理学著作有《诗逆》《言诗翼》《诗经人物考》《圣门传诗嫡冢》《左传合鲭》；陆云龙也刊刻了《合刻繁露太玄大戴礼记》三卷等，并对之校辑、评释、加序。目前学界关于话本小说家的研究以冯梦龙、凌濛初、

^① 陈铭：《宋明理学与明清小说的程式化和教化》，《浙江学刊》1982年第4期。

李渔、陆云龙兄弟为主。但是，这些研究却甚少涉及他们的理学环境、理学论著表现出来的理学思想，而且对小说家除了话本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学样式创作所体现的理学之思亦少关注。这不利于总体把握话本小说所体现的理学意蕴。此外，话本小说的民间信仰题材非常丰富，这些题材并不只是简单地为了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传达出小说的理学思考。然而目前学界却缺少对这些理学方面题材的关注。

第一章 话本小说的理学空间研究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不能超越时代而存在。研究明末清初话本小说，必然要探寻其理学背景。“艺术整体中每一个有价值的成素，都得放到两个价值语境中去理解，一个是主人公的语境，它是认知的伦理的生活的语境，另一个是作者的最终定论的语境，它是认知的伦理的，又是出为形式的和审美性质的语境。而这两个具有价值的语境，是互相渗透的，不过作者语境总想囊括和收束主人公的语境。”^①话本小说的主题意蕴、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所表现出来的理学因子，都不是偶然的。“文学研究者不必去思索像历史的哲学和文明最终成为一体之类的大问题，而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尚未解决或尚未展开充分讨论的具体的问题：思想在实际上是怎样进入文学的。”^②

空间与时间一样，都是人类认知问题的重要向度。按照哲学定义，空间是人们根据事物呈现形态特征所建立的一个概念，体现在物质的长宽高等外部形态，以及物质形态之间普遍的相对稳定的联系。由此，空间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如艺术空间、文学空间等）；有外部的（如地理空间），也有内化的（如心理空间）。将“空间”这一概念引入，可以更好地考察话本小说生产的理学地理分布。

第一节 话本小说地域空间分布与理学地域空间分布

宋元以来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话本小说的生产、繁荣有莫大关系。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话本小说、商品经济、理学的兴盛几乎同步。此现象似乎提醒研究者，话本小说的生产空间与理学空间的并存并非巧合。

① 凌建侯：《话语的对话本质——巴赫金对话哲学与话语理论关系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41页。

②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28页。

一、拟话本小说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从刊刻（包括翻刻）地看，现存明刊本拟话本小说中，浙江23部，江苏24部，福建4部，江西1部，安徽1部。小说刊刻地、小说作者（或编者）籍贯，都以浙江杭州、江苏苏州为主，一些不署作者真实姓名的艳情小说，如《欢喜冤家》《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也多在苏杭刊刻。福建、江西、安徽等靠近苏杭的地区则数量很少。

东南之地是文人聚集的地方，据统计，明代文人中，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上海五省一市共有文人1055人，占明代籍贯可考的著名文学家总数1342人的78.61%。其中，江浙二省文人又占总数的61.15%。清代文人中（截至1840年），这五省一市共有文人1272人，占清代全国著名文学家总数1744人的72.94%，其中江浙二省占70.13%^①。仅从明代考中进士的人数看，江苏以3667名位居首位，浙江以3391名居第二位，次之是江西籍进士，共2690名，福建籍进士共2192名^②。

按照经济发展及科举比例所显示的文化教育状况来看，江浙两地出现众多话本小说家理所当然。但有几个问题有待探究：

其一，虽然江西、安徽、福建三省经济相对落后，但教育并不落后，且都离江浙二省很近，其刻书亦很精良（如徽州刻书），但话本小说极少。

其二，福建在明万历、泰昌时，通俗小说的刊刻最多、最繁盛。建阳书坊中，历史演义、神魔、公案题材最多，世情题材少，苏、杭书坊中世情题材较多。

其三，明嘉靖到万历前期，是福建书坊最为繁盛的时期，以建阳为中心的刻书区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众多通俗小说在此刊刻（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大宋中兴演义》《水浒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万历、泰昌时期，福建所刻通俗小说有26种^③，却没有一种是情色小说。

①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98、162-164页。

② 王玉超、刘明坤：《明清小说作者的地域差异与科举及小说创作的关系》，《兰州学刊》2011年第12期。

③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8页。汪燕岗统计这一时期的通俗小说有40种〔汪燕岗：《论明代通俗小说出版中心的变迁及成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当其他地方大量刊印情色书籍以追求利润时，一向对市场把握准确，并以劣质刊刻来追求利润的福建刻书家并没有跟风而上。

解答上述问题，应从理学思想影响入手。有学者指出：“建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故乡，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他们出版书籍时，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既要盈利又要承担教化的任务，所以大量出版历史演义等宣传‘忠义’思想，表彰忠臣义士的小说，不敢去刊印那些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①此说乃为至论，可惜没有展开。明清理学的两大阵营在东南之地根基各有不同，对小说刊刻的影响也有所差别，尤其对刻书种类与题材选择影响较为明显。

二、福建理学与拟话本小说刊刻

福建理学以朱子学为主。朱熹生在新安，却在福建长大，是闽学开创者。朱子闽学提倡居敬穷理、反躬践行，崇四书。他以讲学传道为己任，讲学时以经学义理教育为主，要求人们明人伦、晓义理。朱熹利用刻书，或宣传自己的学术著作及传播学术思想，或整理前辈理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教学用书。^②朱熹门人也以福建籍为多，这些闽学者的后代多为刻书者。如建阳刻书家刘氏、魏氏、熊氏、黄氏、蔡氏、叶氏等，都是闽学者的后代，且书林人物之间也多存在姻亲关系。^③建阳书坊林立，刻书丰富，刻录了不少理学著作。据林应麟《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统计，福建官刻书籍407种，经部66种，占16%，史部70种，占17%，二者共占33%。在建宁府1603种刻书中，经部234种，占14.6%，史部295种，占18.4%，经史类共占总数的33%。^④很多书坊往往同时兼刻通俗小说与科考书籍。如余氏书坊共刻书235种，经部40种，史部46种，小说38种；刘氏书坊共刻书297种，经部32种，史部64种，小说13种。^⑤总之，福建刻书很重视经史一类的书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学在福建的广泛传播。

① 齐裕焜：《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08页。

② 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③ 方彦寿：《闽学人物对建刻发展的影响》，《福建论坛》1988年第2期。

④ 林应麟：《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鹭江出版社，2004年，第284、309页。

⑤ 《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第309页。后文引自相同书籍时，为避免繁杂，只在引用时指明书目（或篇目）和页码。

福建王学学者不多。黄宗羲《明儒学案》虽设“粤闽王门”，但言及闽之王学学者只有马明衡、郑善夫。王学福建籍弟子主要分布在泉州、福州地区，“闽中学者中即使有个别来越师从阳明者，后来也大都转向了朱学”^①。即便是马明衡、郑善夫，也没有摆脱朱子学的影响。可以说，在明代福建地区，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阳明之学显得冷清。晚明福建的文化巨人谢肇淛（1567—1624）自27岁调任湖州司理，此后绝大部分时间在外辗转做官。他与心学人物袁宏道等颇有交往，但对阳明心学却有所保留，认为“良知”“止修”之说只是拾人唾余，欺世盗名而已，对于信奉李贽学说之人，“甚恶之，不与通”，听闻李贽之死，其评价是“此亦近于人妖者矣”^②。

明嘉靖年间（1522—1566），杭州出现了话本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其中不乏世情题材，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风月相思》等。谢肇淛万历三十四年（1606）评《金瓶梅》，1607、1608两年都待在福建老家^③。在此期间，他完全可以将此书交给书坊刻印——那时，正是福建书坊繁盛时期。与《金瓶梅》同时代的，还有署名为兰陵笑笑生的1606年刊出的《玉娇李》^④。万历三十八年（1610），《金瓶梅词话》在其他地区刊出。据嘉靖《建阳县志》载，当时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⑤，书市盛况空前，与外界商贾往来甚为频繁。对于外界情况及需求，福建书坊坊主应有所了解。

明代福建刊刻的话本小说只有《熊龙峰小说四种》。四种小说中，《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均属于婚恋题材。建阳熊龙峰刊刻过的婚恋题材的作品还有《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⑥。建阳刻书中双峰堂的《万锦情林》、世德堂的《绣谷春容》所选内容有《钟情丽集》《天缘奇遇》《李生六一天缘》《娇红记》《吴生寻芳雅集》《三妙传》《刘熙寰觅莲记》等，属于世情乃至艳情题材。建阳书坊坊主余象斗所刻的《万用正宗不求人》中设有“风月门”，录有很多情书套话和关于春药、房中术

① 钱明：《闽中王门考略》，《福建论坛》2007年第1期，第61页。

② 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③ 陈庆元：《谢肇淛年表》，《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21页。

④ 李忠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⑤ 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封域志》。

⑥ 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37页。

乃至其他风月的知识。可见，建阳小说并非不懂得采用世情题材，更不是找不到新的题材，而是不愿意使用这些题材继续编撰话本小说。否则，以福建人之才华，建阳书坊坊主之精明及职业敏感，建阳书坊编写、刊刻更多的话本小说不是难事。话本小说先在福建刊刻，当话本小说盛行时却没有继续刊刻，除了没有专业人才从事话本小说创作外，或许与话本小说的题材多涉及婚恋有关^①。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福建书坊刊刻小说时有意识地弱化世情题材，进而束缚了话本小说在这一地区的刊刻。谢肇淛评而不传播《金瓶梅》，也当与其作为福建士人固有的观念相关。

三、江西、安徽理学与拟话本小说编撰

话本小说在江西及安徽也很寂寥。早在明嘉靖时，徽州歙县刻铺比比皆是，有“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之说。万历以后，“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②。胡应麟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③ 谢肇淛也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④ 徽州官刻、坊刻、私刻颇盛。刻书种类繁多，谱牒、经史子集、日常用书都有刊刻，“以数量而言，明代徽州私人刻书数以千计种次”，“清代前期，徽刻承明代遗风，还较兴盛，比较有影响的刻铺仍有三十多家，刻书仍有数百种之多”。^⑤ 然而，这众多的刻书中，通俗小说却极少。究其原因，当也与理学有关。

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朱子阙里”。徽州民众“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⑥。“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

① 《万锦情林》《绣谷春容》虽然也是白话，却属于通俗类书，不是专门的话本小说集。《天缘奇遇》《李生六一天缘》篇目较长，属于“文心”者居多。

② 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324页。

③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第59页。

④ 《五杂俎》，第266页。

⑤ 叶树声：《徽州历代私人刻书概述》，《徽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第29页。

⑥ 吴翟辑撰：《茗州吴氏家典》，黄山书社，2006年，第3页。